

學術論文

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下中日關係之未來走勢

Geo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Future of Sino-Japan Relations

巴殿君 *Dian-Jun Ba*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
Professor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安倍政府第二次執政以來，擺出「對美重視，對中牽制」的姿態。目前來看，中日雙方緊張關係有所緩和，但仍面臨一系列「可燃性較高的政治課題」。如果雙方不小心謹慎地管控上述政治課題，將會繼續惡化中日關係，客觀上制約了該地區進一步的發展。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是兩國是否都會沿著和平發展道路同向而行，推動中日關係的戰略互惠是中日關係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合作友好仍是今後は構建中日關係原點。在雙方矛盾不會簡單消失的前提下，必須要避免中日關係從「一種已經很複雜的關係」，演變為「更加複雜的關係」，從而出現新的裂痕。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Japan has adopted the posture of emphasizing the US while containing China. Currently, while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s relaxed somewhat, both countries still face a series of highly explosive political issues. If both China and Japan are not cautious enough to manage the politics between them, one can expect China-Japan relations to deteriorate and limi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s whether Beijing and Tokyo would both move forward alo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future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lies in strategic reciprocity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remains the key to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future. In the circumstance that paradox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disappear easily, Beijing and Tokyo must prevent the alread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becoming even more complicated and giving rise to new challenges.

關鍵字：中日關係、結構性碰撞、安倍談話、戰略互惠

Keywords: China-Japan relations; Structural Clash; Abe Statements; Strategic Reciprocity

壹、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困境

當前，國際新秩序正在形成，全球化日益加深將帶來的風險，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國際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疾病流行等。全球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東亞的發展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重要事件之一。世界格局動盪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環境。東亞的戰略環境面臨著三大地緣政治困境。即，「大國困境」中的「戰略競爭」、「鄰國困境」中的「戰略猜疑」、「同盟國困境」的「戰略選擇缺失」的問題。

一、大國困境

東亞集中了世界上主要大國，伴隨中俄日主要大國幾乎同時群體性崛起，美國戰略東移，大國競爭狀態成為東亞安全面臨的巨大考驗。首先，大國的競爭的範圍更加廣泛。不僅是安全領域的競爭，還包含了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全方位的競爭，這比起歷史上任何霸權國與挑戰國之間的交鋒都要廣泛的多。其次，圍繞朝鮮半島，大國的競爭具有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繫從來沒有如此緊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核武器的開發與擁有，導致相互敵對衝突的代價將是「相互摧毀」。大國之間的競爭不僅要受制於相互依賴，也無法承受核時代「相互摧毀」的後果。在緊張多變的國際體系中，深入而全面的相互依存與嚴重後果，決定大國在處理朝鮮問題方面必須慎重對待，謹慎維持區域的戰略平衡。再次，中美的競爭更加多變與深入。中國國力上升沒有讓中國變得更加安全，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國把安全重心轉向亞洲的戰略反應。美國加強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外交活動和一系列戰略部署已充分，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將嚴重考驗著中國的外交技巧。

總體而言，中美競爭既不屬於蘇美兩極意識形態抗爭的類型，也不是大國權力更替中對外領土擴張的「權力衝突」的必然歸宿。中美關係的多變性取決於當今不斷演變的國際體系。中國既是戰後秩序的收益者，也是改變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在這樣的國際體系之中，中美合作的數量與品質都是歷史上挑戰國與競爭國之間未曾發生的歷史現象。中國接受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現實，中國的全球外交政策放棄「結盟」均勢手段，也沒有「干涉內政」的霸權行徑。由於中國並非歷史上傳統類型的對外擴張主義者，也不追求世界霸權主導大國的地位，其戰略目標更多地體現出「民族復興」的歷史重塑，這保證了中美關係的發展具有某種穩定的可持續特徵。

二、鄰國困境

鄰國將發展到一個什麼程度？它在經濟上有什麼樣的影響？它的安全政策如何？未來的發展動向與影響？是任何相鄰國家關心的問題。1990年代初期，隨著冷戰的結束，中韓建交，日朝、韓朝關係處於邦交正常化建立的摸索時期。政治環境的改善為區域內鄰國之間的合作增添了動力。一方面，鄰國之間的相互的經貿關係不斷強化、人員交往越來越活躍。區域內各國利用地理相鄰、資源互補等天然優勢推進合作。目前，中日韓的經濟相互依存空前緊密，產業鏈條互補關係明顯，如，日本生產設備、韓國製造元件、中國進行組裝等。其相互合作發揮了各自的長處，中俄朝經濟合作也在不斷加強，物流開發與海港建設、經貿額度不斷增加。區域內鄰國關係的互補與互助的特徵，為這一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經濟能量。可以預計未來 20 年經濟要素在這一區域的自由流動將會更加緊密化，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居于有利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朝鮮半島及其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模式多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模式，還有「君主立憲，先軍政治」政體等國家同時共存，種族、語言、文化、經濟發展等差異巨大，二戰遺留的國家分裂、領土糾紛、歷史

評價等問題引發的矛盾與衝突事件頻發，各國利益訴求迥異。尤其是朝核問題的出現，導致了區域安全環境惡化，同時，巨大的民族主義爭端與持續的政治分歧，導致一些鄰國之間的利益難以調和。可以說，經濟關係的強化與安全、政治關係的惡化是區域內「鄰國困境」的主要特徵。如何解決周邊鄰國之間的「戰略猜疑」，解決鄰國之間「安全困境」問題是今後區域發展與合作的又一個不能忽視的障礙。

三、同盟困境

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各國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結盟」安排進行合作、以增進他們的安全，防範可能構成威脅的行為體。這種「同盟」的合作與安排是由對手之間的實力關係決定的。一國與預期敵人的實力差距越大，就越可能結盟。一旦結盟出現所謂「同盟困境」。同盟會帶來兩個彼此關聯的擔心：拋棄與牽連。

前述「同盟困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同盟內「國家關係模式」來看，一些小國家為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通過與大國結盟，為自己上了保險。但對外戰略實施方面，卻游刃於大國矛盾之間，更多地體現出「主動出擊」，一有「風險」要由大國共同承擔。有著綁架大國的傾向。另一方面，從同盟內「國際關係模式」看，冷戰後，中國的不結盟政策與美日韓的同盟集團存在「權力失衡」的局面。中國 30 年的對外政策並沒有把重點放在建立戰略聯盟上。相反，重點被放在了保持與美國的穩定關係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環境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上面。西方國家一直通過結盟對付所謂的「朝鮮威脅」與「中國威脅」。面對日美韓軍事同盟的戰略實施，中國主張不結盟政策，事實上弱化了中國自身安全和利益。中國要思考如何解決與相關國家的「戰略選擇缺失」的問題，認識到只靠自身的發展「不是硬道理」的問題。

貳、中日關係面臨的問題

一、領土主權「碰撞」

近年來，直接導致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源於釣魚島領土爭端。至今為止，儘管釣魚島主權爭端已經趨緩，但這一領土問題現階段無法取得根本性改善，長期來看，仍會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¹這不僅可能危及日中貿易，而且將會進一步破壞雙邊的政治關係，甚至可能引發軍事衝突。釣魚島領土主權問題是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將會成為整個中日關係停滯的潛在熱點問題。不論中日經濟關係如何相互依存，政治安全層面的因素可能使整個雙邊關係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在釣魚島領土主權之爭方面，今後的中日關係面臨兩大考驗：一是不排除日本右翼政客再次挑起事端，造成緊張關係的惡性循環。近年來，日本右翼組織，如，「日本會議」、「櫻花頻道」、「在特會」（不允許在日特權市民協會）等仇恨言論引發國際社會擔憂，這些組織利用領土問題糾紛，煽動右翼民族主義，推動修改日本和平憲法。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政界表現出複雜、焦躁情緒。日本右翼政客此前就是利用中日領土問題，挑起釣魚島主權之爭，意圖推動日本向軍事大國轉變。此外，從目前的安倍對華政策來看也不容樂觀。在釣魚島問題上，一方面，安倍不斷提升、加強日本國防安保能力，解禁集體自衛權，開啟對華軍事對抗的準備。另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逼迫美國承擔作為盟友的職責施以援手，將美國捲入對華戰爭。2015年7月15日，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遭受國內民眾強烈抗議，內閣支持率急劇下滑。今後安倍政府有可能希望拋出反映日本周邊安保環境變化的「中國牌」，來轉移針對法案的批評。²不排除進一步激化釣魚島與東海領土之爭，以求達到轉移國內民眾視線的目的。可以說，中日領土爭端始終成為中日關係摩擦的根本原因。

¹ 邁克爾·奧斯林，〈海上邊界〉，《外交政策》，2012年12月18日。

² 古森義久，〈強化日美同盟對穩定日中關係有益〉，《產經新聞》，2012年12月29日。

二、歷史認知「碰撞」

歷史觀的差異是中日關係趨於緊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影響今後中日關係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一直以來，兩國在「戰爭反省」方面，出現了巨大分歧。日本方面認為，由於戰爭責任問題已經解決，沒必要不斷地道歉。此次「安倍談話」呈現出淡化戰爭責任的傾向，表現如下四個方面：首先是提出「侵略背景論」。認為日本侵略只是對歐美帝國主義列強擴張政策的效仿，具有當時代的「普遍性」特徵。其次是提出「侵略被動論」。指出日本發動的戰爭是針對歐美帝國主義的被動反應。與最早發起帝國主義擴張以及殘暴的滅絕種族主義戰爭相比，不能只揪住日本的侵略行為不放，日本的侵略行為是被動性的反應，有著「自救自衛」的「特殊性」。第三是提出「戰爭受害論」。客觀上講，「安倍談話」不是沒有反省這場戰爭，但反省的重點更多的是這場戰爭如何將日本拖進了戰爭的深淵，導致日本 300 多萬的國民死亡。這種反省有著極深厚的「受害者意識」。第四則是「謝罪終結論」。認為戰後 80% 成長起來的日本國民不應再背負日本侵略歷史的包袱，日本已經完成足夠反省。強調日本戰後對國際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包括對中國等國家。

「安倍談話」將戰爭責任轉嫁給了歷史，是在背離歷史的同時強調面向未來。涉嫌鼓吹對中國進行牽制，正如左手尋求握手，右手揮起了拳頭。³從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不僅是對「侵略戰爭的反省」不夠深刻，甚至是在否認、美化侵略戰爭。「安倍談話」將中日雙邊關係劃定一個方向，儘管中日雙邊緩和的進程不會再次脫軌，但標誌著日本在鄰國當中獲取信任的糟糕的開始。⁴可以說，「安倍談話」這種不正確的歷史觀一旦被繼承下來，將會成為影響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

³ 山室信一，〈安倍談話反映了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觀〉，《朝日新聞》，2015 年 8 月 15 日。

⁴ 馬丁·克林，〈帶有怪味的戰爭紀念〉，《商報》，2015 年 8 月 15 日。

三、意識形態「碰撞」

進入 21 世紀，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日本版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日本的「國家主義」開始膨脹，正經歷「國家主義的複權」。⁵一些日本政治家認為，中國不會成為民主主義體制的國家，「在中國控制的世界中生存會令人不安」。⁶對此，日本保守政治家發動意識形態「聖戰」，文化戰爭死灰復燃。⁷2012 年 12 月 28 日安倍晉三接受日本《讀賣新聞》獨家採訪時強調繼續推動「價值觀外交」，強化與尊重民主主義和基本人權的國家聯合，共同應對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構架民主同盟的包圍網。⁸安倍政府強調的價值觀外交，提出所謂的「價值觀同盟」、「菱形戰略」、「俯瞰地球儀外交」與「積極和平主義」等的戰略構想，不過是通過該地區的「民主力量」為中國遵守國際秩序設定「議程」，發揮「民主影響力的制衡」與「防務力量制衡」的兩手戰略，達到更好地約束中國行為的作用。

與此同時，安倍試圖「擺脫戰後體制」，公開提出修正歷史，壓制公開言論、制定「保密法」、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詆毀和平憲法，對日本和平民主社會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導致日本國內民主勢力的強烈反對，這場國內鬥爭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國際社會，日本右翼政客發動的意識形態的「聖戰」，促成了國際性歷史認知的反日聯盟，不僅削弱了日本民主價值觀，將日本置於自由民主國家對立的一面。⁹戰後支撐日本和平民主主義的兩個支柱：日本國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衛」的安保體制都遭到破壞。日本政府無視民眾的反對，通過擺脫戰後體制，顛覆歷史事實，以應

⁵ 先崎彰容，〈同混亂的東亞對峙的日本國家主義的複權〉，《正論》，2014 年 4 月號。

⁶ 東京新聞，〈構築百年和平〉，2015 年 7 月 19 日。

⁷ 傑夫·金斯頓，〈安倍文化戰爭讓日本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日本時報》，2014 年 2 月 22 日。

⁸ 每日新聞，〈面向未來之路仍然坎坷〉，2013 年 1 月 5 日。

⁹ 同前註。

對中國崛起等安保環境變化，對中日關係產生重大影響。¹⁰

四、安全戰略的「碰撞」

進入 21 世紀，中美戰略競爭趨勢加劇。美國對華戰略思維從「遏制加接觸」轉向純遏制。¹¹面對中國崛起的「威脅」，在強化日美同盟體制前提下，日本不僅要經濟「重返江湖」，將自身打造成重要的國際力量，而且政治安全方面也要發揮著全球性作用。日本同中國的對抗與競爭正在全球範圍展開。¹²2015 年 4 月 29 日，美日舉行「2+2」美日安全磋商委員會，通過制定修改「美日新防衛指針」，實現美軍與自衛隊的戰略目標、戰略計畫、戰略空間與戰略手段的無縫對接。新指針從東海到南海、從亞洲到全球、從太空到網路，全方位地將圍堵中國納入了「大戰略」之中，日美同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¹³日本的安全政策已經「從靜止的遏制力向動態的遏制力方向轉變」，跨出「專守防衛」這一安全門限。這種安全戰略方向的演變，正在為日本軍事崛起鬆綁。

中日安全關係的「碰撞效應」已經「外溢」至東南亞地區、甚至進入到更遠的地區。日本不斷強化與中國有領土之爭的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的關係。中日安全關係正在從島嶼之爭逐漸向海上競爭演變。2015 年 7 月 21 日，日本公佈的最新版的防衛白皮書，公開在南海與東海問題挑釁中國，認為中國是「國際社會——首先是美國的憂慮之源」。¹⁴公開介入南海領海之爭。日本近期在東海與南海的強硬立場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日本當前更在意的不是改善對華關係，而是準備開足馬力推進對

¹⁰ 日本經濟新聞，〈你該知道的集體自衛權〉，2014 年 4 月 18 日。

¹¹ 斯蒂芬·哈納，〈在安倍領導下，日本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福布斯》，2015 年 4 月 29 日。

¹² 尼克·比斯利，〈中國，要小心了：強大的美日聯盟正走向全球〉，《國家利益》，2015 年 5 月 1 日。

¹³ 阪元一哉，〈日美新指針強化同盟的紐帶〉，《產經新聞》，2015 年 5 月 5 日。

¹⁴ 讓·蜜雪兒·格拉特，〈日本批判中國的海上野心〉，《世界報》，2015 年 7 月 21 日。

華對沖戰略，與美國及南海地區其他國家深化戰略合作以牽制中國。¹⁵中日雙邊關係日趨複雜並向著多層化方向發展。有可能成為 21 世紀比較令人擔憂的大國對抗關係之一。

參、中日關係未來發展趨勢

自 1972 年中日建交以來，中日關係儘管摩擦不斷，但是合作友好還是過去這段時期的主流方向。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中日關係不斷惡化。儘管中日已經舉行了兩次首腦會面與其他高級別會談，日中高官對話呈現機制化趨勢，雙邊緊張關係有所緩和，但兩國關係的複雜性與敏感性依然突出。¹⁶由於安倍全力推進「擺脫戰後體制」、「解禁集體自衛權」、「民主價值觀同盟」等措施，致使中日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碰撞」特徵。可以說，未來安倍執政下的中日關係並不令人感到樂觀。

安倍在就任首相伊始後的歷次記者會上均強調：「日中關係是 21 世紀外交及安保上的最大課題」，顯示日本重視日中關係的立場。但實際上，安倍政府明確擺出了「對美重視，對中牽制」的姿態。¹⁷目前來看，中日雙方儘管有著較強的經濟紐帶，另一方面仍面臨一系列「可燃性較高的政治課題」。¹⁸如果雙方不小心謹慎地管控上述政治課題，將會繼續惡化中日關係，客觀上制約了該地區進一步的發展。

中日關係發展軌跡大的背景仍然是當前和平發展國際環境，小的動力則來源於政治和解會帶來經濟利益的遞增。自中日關係惡化以來，雙邊貿易在 2013 年驟減 6%，減至 3430 億美元，2014 年也是停滯不前。¹⁹雙方

¹⁵ 保羅·卡倫德—梅津，〈東京將在永暑礁問題上挑戰中國〉，《防務政策》，2015 年 7 月 20 日。

¹⁶ 倉重奈苗，〈日中高官對話呈現機制化〉，《朝日新聞》，2015 年 7 月 17 日。

¹⁷ 〈政策再轉換—外交安保政策以美為主盯住中國〉，《朝日新聞》，2012 年 12 月 30 日。

¹⁸ 古森義久，〈強化日美同盟對穩定日中關係有益〉，《產經新聞》，2012 年 12 月 29 日。

¹⁹ 大衛·特威德，〈中日正在改善關係但這會持續多久？〉，《日本時報》，2015 年 7 月 3 日。

在核心問題上的敵對立場如果長期存在的話，勢必導致中日關係「政冷經冷」的局面。

從地理方面而言，中日都處於「地緣政治變化的板塊地帶」相鄰國家。意味著中日兩國都有機會參與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的構建。中日關係進入轉折期，挑戰與機遇同時存在。合作友好是構建中日關係原點，減少戰略互疑、戰略互損，推動中日關係的戰略互惠，是中日關係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是兩國是否都會沿著和平發展道路同向而行。在雙方矛盾不會簡單消失的前提下，必須要避免中日關係從「一種已經很複雜的關係」，演變為「更加複雜的關係」從而出現新的裂痕。

責任編輯：林正斌、賴郁璇

